

思前想後

「一國兩制」二十年

後九七香港的後殖民情狀

The Post-colonial Situation

of Post-1997 Hong Kong

A Reflection up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fter the First 20 Years

張少強 *

Siu-Keung Cheung

摘要

根據本是用來統一台灣的「一國兩制」構想，香港至今已然受到中共統治二十年。本文旨在檢視中共以此方式推動出來的統一政策，在後九七香港構成了何種的後殖民情狀。從對一國兩制帶給後九七香港的重大衝擊進行反省，本文指出後九七香港確已有別於英治時期的歷史政治局勢，可是這樣的一種後殖民情狀卻令香港本土的「脫帝解殖」追求，要在親共的愛國主義之下受到困阻，遭致無間殖民之害連同大國誓要專權統攝之苦。

* 張少強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7 年 7 月 14 日；通過日期：2017 年 10 月 17 日。

關鍵詞

一國兩制、本土主義、後九七香港、後殖民主義、親共愛國主義

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has now been ruling Hong Kong for 20 years. This study reflects upon the post-colonial situation placed by such a ruling formula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s plan of reintegrating Taiwan into China. This work demonstrates how post-1997 Hong Kong differs from its British colonial past. However, such post-colonial difference hinders post-1997 Hong Kong from pursuing deimperialization and decolonialization under pro-communist patriotism.

Keywords

Localism,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st-1997 Hong Kong, Post-colonialism, Pro-communist Patriotism

時間已在殖民之後，年代還在殖民之時，白人的強者形象依然、歐美的文化霸權延續、西方的統治權術保留，這是大量前殖民地共有的現實諷刺。職是之故，Memmi（1965）筆下的受殖者總是要跟白人相比但又自慚形穢；Fannon（1967）在個人反殖革命思想深處還是想有白人的面相來遮掩黑色的身體；Said（1979）看到東方的構成已在西方的建構中陷入無法逆轉的自我異化；岩淵功一（1994）所見的「日本特性」充滿殖民論述跟民族論述一起共犯而來的錯誤定型；Nady（1983）觀察後殖民印度所得的竟是二次殖民的自我殖民；陳光興（2006）

期望的「脫帝解殖」(de-imperial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在亞洲仍然舉步維艱；Hardt 及 Negri (2000)發現今天的全球格局只是進入了一個新的帝國年代。

作為一塊前殖民地，香港跟其他前殖民地的最大分別，在於沒有走上獨立之路，就連自身的反殖力量，本土的、右派的、左派的，全都在殖民時期位處邊緣，只能等待 1997 年英國統治香港的大限到期。到了中共正式來臨之後，香港又被安排最先成為在中國之內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是用來統一台灣的「一國兩制」構想，受到中共統治至今二十年（劉兆佳，2014）。那麼，由中共藉此方式推動出來的統一政策在後九七香港所構成的後殖民情狀是何種的後殖民情狀？對於「脫帝解殖」的追求，後九七香港正在面臨什麼歷史格局？除卻有可能陷入「無間殖民」（羅永生，2007）之外，後九七香港就是一個「凍結的時間，凍結的空間」（張少強，2008）而沒有任何新的權力範式及操作嗎？這是本文嘗試述評的課題並以此作為切入點，指出由「大國崛起」所造成的在地張力，反省當前的帝國宰制對包括香港在內的第三世界正在構成什麼急迫鬥爭。現先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原先歷史政治作用說起。

後九七香港以「一國兩制」作為管治藍圖，確曾勢難抗拒，既令英國無法扭轉交還香港主權的歷史宿命，也在提出之初成功穩定本是誠惶誠恐的港人情緒。這個管治藍圖能有如此決定大局之效，主要由於中共在此主動擱置了冷戰時期的兩極對立。當中包含由鄧小平親自許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管治承諾，對於香港本土來說，尤其具有懷柔作用。從中國的自身歷史觀之，這樣的後殖民統治政策可以濫觴古代的「土司制度」（吳永章，1998），以英國的殖民歷史鑑之，這樣的後殖民統治政策則可視為「間接管治」的延伸（張少強，2016）。然而，正如金堯如（1998）在個人回憶錄中指出，這樣的後殖民

統治政策實乃更大程度上，是從毛澤東年代的「愛國統一戰線」演變出來，特別是當中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

是故，中共在那段時期的香港政策已在訴諸愛國主義來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對於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更是無意挑動，反而有意化為己用，藉此建立海外連線，包括賺取外匯，以及權力外展。周恩來於 1951 年向在港的地下幹部傳達中央指示之時，已明言「你們要好好保護它，不要破壞它」（金堯如，1998，頁 5）。由於「一國兩制」就是把冷戰年代的權宜操作變成後冷戰年代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在一國之內接受後九七香港可以自成一體、維持現狀、保留異質，大量由意識形態及政治體制分歧而來的敵對狀況已是看似一掃而空。中共要向英國討回香港主權之時也見位處談判優勢，能以這樣一種帝國式的化外政策來贏取主導地位（強世功，2008a；2008b；2008c），具認同政治性質的政治手腕（politics of recognition）來收編港人（陳冠中，2013）。

即使早於 1970 年代開始，英國已就爭奪後九七香港主權加緊部署，然而英國採取的永續殖民統治策略乃是，因應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宣傳，港人對社會主義心存抗拒，特別是由 1967 年香港左派大舉「反英抗暴」所帶來的集體恐慌，着力粉飾昇平，追求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營造香港為「繁榮安定」之地。透過中港兩地生活水平相距愈來愈遠，差異愈來愈多，英國望能得到的最終結果就是在一高一低之下，自身的殖民統治可以贏取港人認同，跟中共爭取後九七香港主權能有更大的政治勝算（呂大樂，2011）。這樣的永續殖民統治部署確有在香港本土大收洗腦贏心之效，但終歸好像不攻自破，替了別人作嫁衣那般敗陣，顯然在於英國沒料得到，中共原來可以正式接納由資本主義而來的「繁榮安定」。把近代中國的想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變成社會主義為「中國的主體」，資

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鄧小平, 1993 : 頁 6)。在鄧小平領導之下, 中共所走的路線竟是「開放改革」的後社會主義轉向 (Dirlik, 1989), 重點在乎「克服『左』的錯誤, 堅持從實際出發, 實事求是」(鄧小平, 1993 : 頁 5), 由「一國兩制」衍生出來的《基本法》可以根據《中國憲法》, 好像處理西藏和台灣問題的「十七條」和「葉九條」那樣 (強世功, 2008a; 2008b; 2008c), 採取例外主義 (exceptionalism), 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兼有條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基本法》, 2007, 「第五條」)。因「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之名, 但同時又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在「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之下, 中共寫在國家典章的統一政策可以是如此有「統」而不「一」的複合政策 (《基本法》, 2007, 「序言」)。

同樣道理, 後九七香港以「一國兩制」作為管治藍圖, 也曾好讓港人憧憬自身的未來可以不受中共干預, 反而能在自身的政治體制及生活方式中保持「繁榮安定」。憑着中國未有的「繁榮安定」, 鄧小平也希望「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鄧小平, 1993 : 頁 39), 樂觀者更是相信香港復有機會延續「奇蹟」, 成為中國的典範, 帶領中國的經濟發展 (任海, 1997)。即使一直都是半信半疑, 中途襲來六四事件, 中英長期爭拗, 以至中共一手推翻由末代港督彭定康 (1992—1997) 推出的民主改革, 香港本土對於自身的未來仍是懷着信心, 沒有出現可令局勢改變的危機 (Nicholas, 1999)。雖然擔憂中共接管之後可能不守承諾確實有增, 無法「民主回歸」的陰霾愈來愈濃, 可是整體格局還是在「繁榮安定」之下, 由一塊英國殖民地變成一個中國特別行政區 (Kuan, 2003)。港人對英國殖民者終歸不惜觸怒中共, 而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 也或多或少抱有謝

意。因而，西方殖民主義在香港走到最後一刻能夠變成一個可令港人留戀的「美好年代」(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2013；張少強，2014)。這就使得許多港人經常都在回憶中緣木求魚，回到這個根本無法回到的年代來掙脫當前的後殖民處境，甚或挑戰當前的後殖民處境，包括對英治時期沒有親身經歷只有事後想像的新生一代(羅永生，2014a)。

反之，一國兩制在後九七香港成為管治實踐之後，並無使得真實的結果跟原有的期望一致。既由無法預計的變數使然，也由自招而來的禍害導致，後九七香港接連受挫，已近換了人間那般急轉直下，以至有「已死」之慨(張少強，2014)。昔日的盛世，港人的自信，由殖民年代打造出來的集體驕傲，先被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捲走，橫加「SARS」疫情威脅全城生命，再被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淹沒，縱然總算走出低迷，恢復過來，但普羅大眾的生活條件與感覺已是大不如前，雖說沒有如同其他地區那樣，淪為「M型社會」或「下流社會」，但亦變成了一個「沒有憧憬的後工業社會」(張少強、崔志暉，2015)。復以地產市場，暴斂成性，刮龍如狂，生活居所被過度商品化，就連「劏房」都能奇貨可居，成行成市，大量港人苦被塞入窄小如盒的居住空間，長期身處無倫的經濟宰制，活在令人沮喪的生活環境(Wong Chun Kit, 2017)。

這就是說，除卻千篇一律的官方發言或文獻，後九七香港見證得更多的乃是，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曾有的「繁榮安定」驟然褪色，剩下總要依賴內地那般，只可在國家之內發展，無復當年之勇，失卻曾經有過的全球地位(張少強，2017a)。可是，本在殖民年代仍是行之有效的發展主義，並可以此換取統治地位的管治模式，卻在新一代的本土主義急遽冒起之下，變成後九七香港的民間力量跟特區政府持續爆發出來的主要爭端。以其大者來說，就先有2006年的反清拆天星碼頭，2007

年的反清拆皇后碼頭，繼有同一時期的反清拆囍帖街、反清拆菜園村、反發展高鐵接踵而來，以及相對較後的反東北發展計劃（李立峯、陳韜文，2013）。

在此肅規難再曹隨之下，中國政府連同特區政府明顯未願放棄一國兩制所要保留的英國殖民管治模式。習近平反而一度警告：一國兩制務必「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文匯報》，2015年12月24日），中港高官則指示治港班子「不忘初心」（《星島日報》，2017年6月27日）。結果，中國政府連同特區政府經常變本加厲，絕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那般，訴諸「認同祖國就有經濟發展」來訓導港人，搬出這樣一種「功利愛國主義」來保持一國兩制的原有方針，透過「一國」帶動的經濟發展來達致「兩制」所要的「繁榮安定」。然而，這也導致香港本土在「功利愛國主義」的經濟發展之下，進一步面臨更多的內地衝擊，更覺香港的原有秩序及生活受到內地統攝與侵擾。本是反發展、反改變原有事物的本土主義，同時變成反內地、反功利愛國主義的自我捍衛。對新移民、自由行、水貨客、內地文化及資本，浮現強烈的排外情緒（陳智傑，2013）。中港矛盾一發不可收拾。香港本土追求自我捍衛隨之愈演愈烈，從原有的保育層面升至體制層面。換來的結果就是引發了大量反內地統攝的集體抗爭，例如：反廿三條立法、反國民教育、反人大釋法、反「8.31」政改框架，這樣一類沒有止息、總是反覆重來的政治爭端（劉兆佳，2013）。香港本土要求自由民主則更為迫不及待，終告在2014年爆發大規模的「雨傘運動」，歷時79天，在全球目擊之下反抗中國政府對香港民主進程設限定界，並在2016年上演「旺角騷亂」，把被扼殺的政治訴求暴力地變成一塊一塊磚頭掙向警察。特區政府的統治地位，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統治地位，則再次押在防暴警察的武力裝備來維持下去，縱有大量喉舌常

把功利愛國主義宣傳為北京的慈愛對香港的恩澤，都因當權者終歸是講暴力來鎮壓民間而變成一堆假惺惺的政治謊言，令人對當權者的權力支配更加抗拒（張少強，2016）。

出於一國兩制有「兩制」無「一國」之危，中國政府也親自把控制香港的權力戰線，變成重新列明一國兩制的意思，於2014年正式頒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直接指出中國政府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與此同時，在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原則亦已在不同層面變成強制性的意識形態指令。從事物名稱、學校教育、社區活動，到官方言論、政策方向、行政命令，中國政府連同特區政府都試圖以愛國主義來進行思想改造，把政不通，人不和，視為「人心未歸」。即使自身的意識形態指令得不到真心，也不許人表露真意，推出〈國歌法〉那一類的愛國主義律令來規範身體，要人的軀殼對國家象徵作出指定的肅立和舉止（中國人大網，2017）。為求愛國主義可以一枝竹竿插到底，第四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未正式就任之前，已急於表示將要從未有思想的幼兒入手，企圖早在幼兒教育層面開始「政治正確」灌輸，搶先在下一代有意識出現之先，就讓愛國主義佔據人的腦袋，駐守人的內心，以保中共所要的「領土完整」及「國家安全」（《明報》，2017年6月21日）。

歸根究底，這是由於一國兩制其實是以身分認同為核心的權力支配。例如：毛澤東曾說：「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毛澤東，1999：頁337）周恩來也曾提出：「香港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0：頁83）因此，在未跟英國展開談判之前，中共一直都可不急於收復香港，但又充滿信心總可收復香港。直到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鄧小平同樣認定這樣的民族身分認同是當然的。只要有此民族身分認同，這就可以超越華人內部分歧，

以「中共作為祖國」統治香港。故此，鄧小平在評論港人的身分認同之時，有以下的民族扣連：

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什麼服裝，不管是什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的。（鄧小平，1993：頁7）

鄧小平在說明一國兩制中的港人治港之時，則對後九七香港有以下的身分指令：

港人治港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上：頁7）

時至今天，「愛國愛港」已在中港之間成為中共對香港進行政治號召的標準用語，明顯就是由這種要對香港重申主權的身分規訓繁衍出來。故此，大量中港官員、親共喉舌、政黨、團體，要以這樣的身分規訓來鞏固國家的統治地位之時，往往就是照本宣科，一再好像歷任國家主席如胡錦濤那樣，反覆強調港人應要「求同存異」、「包容共濟」、「齊心協力」，「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緊密團結起來，在維護國家利益、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的基礎上共同奮鬥，堅持不懈地維護和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香港政府新聞網，2007年6月30日）。當這些國家力量要把香港本土爭取的民主選舉排除在外，這樣的身分規訓則經常變成身分脅迫，以強迫別人承認為「中國人」這個民族身分來強迫別人接受愛國主義。到了別人不敢否定愛國主義之時，這些國家力量就來強迫別人作為「中國人」接受一黨專政的國家支配和政策，從而肅清其他主張和力量，只有無出

其右的中共統治。舉凡沒有就範，堅持民主抗爭，就視為「反中亂港」，扣以損害香港、損害國家、損害民族，甚或勾結外國勢力的一連串政治帽子，不惜違背「和諧社會」，也要「依法辦事」，從嚴懲處，試圖以法律來剷除，警察和監獄來杜絕。獨立的司法、公正的法庭、公平的審理已見可被用來發動政治的狙擊、異議的遏制、抗爭的嚇唬，誓把專權者眼中視為敵人的民間領袖鎖入囹圄為止的權力工具（《香港經濟日報》，2017年8月17日）。

面對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指令，既夾雜「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那一類古代皇權思維，又以現代民族主義身分認同來推動的一黨專權統治，許多長期都在香港本土被視為必須的原則，如：尊重人權、順應民意、享有言論自由、沒有思想控制、恪守三權分立、個人生活不受政治干預，往往都被歪理連篇的講法扭曲，受到赤裸裸的強權支配橫暴打壓。直至2016年，傳出「銅鑼灣書店」那一類政治事件，涉嫌有中共官方的「強力部門」擄人入境秘密審查，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已見瀕臨崩潰（《環球時報》，2016年1月6日）。到了2017年，先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公開表示：「《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現實。」（《香港01》，2017年6月30日），後有香港特區政府對《基本法》條文的詮釋，竟可用來支持高鐵通車之後，相關中國部門可在香港境內執法，如同「業主」有權向「租客」租回一個房間來自用，更令港人直接感到官方已在背棄一國兩制，亂找胡言來搪塞（《明報》，2017年7月27日）。

出於一國兩制有「一國」無「兩制」之勢，香港本土則倍加着急要有更徹底的自我捍衛。好像自2003年伊始，由民間

人權陣線定期發起的七一遊行，到了 2017 年就是提出「一國兩制，呢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作為行動主題（民間人權陣線，2017）。對應中國政府連同特區政府的身分政治，香港本土的自我捍衛也同步由體制層面升至身分層面，以「香港人」這個身分來抗拒中共的愛國主義及權力支配。最終，就是在「我要真普選」此類由來已久的民主訴求之外，走出了好像「香港歸英」（香港歸英運動，2017）、「城邦自治」（陳雲，2011；2014）、「獨立建國」（香港民族黨，2017）那樣的新起政治主張。即使這些新起主張的可行性成疑，但已足以顯示香港本土對長期以來都無突破的民主追求有恨鐵不成鋼之憤，也認為在一國兩制下尋求民主選舉有與虎謀皮之感。

在另一邊廂，中共則突然驚覺，自身的國家主權一直賴以維持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竟然在香港並無預期的絕對作用，相反一批接一批的抗共青年及大學學生往往結社組黨、湧上街頭，反大陸、反國家、反北京對香港的統治地位，以至在大學校園的民主牆廣貼「拒絕沉淪，唯有獨立」的標語（《立場新聞》2017 年 9 月 3 日）。毛澤東年代的愛國統一戰線儼如已走到了盡頭那般，攻不下後九七香港，鎮不住這個後殖民小城新一代的心。這就導致可以用來確保自身能有統治地位的終極基礎出現無法想像的動搖，也只能繼續死守這一條已在中港官員口中說了出來的「底線」（《蘋果日報》，2016 年 8 月 17 日）。這是何以特區政府極力鼓吹民族情緒，就連封了塵的「抗日戰爭」也重新拿來鄭重紀念（香港政府新聞網，2015），明知不合本土民情也要推動「中港融合」（梁振英，2012；2013）。一發生候任立法會議員好像梁頌恆及游蕙禎的宣誓事件，中共立時不顧地方投票結果，也不顧自身國家形象，啟動最高的權力機關，直接釋法來杜絕被中共認為不合乎愛國主義的立法會議員正式履新或繼續就任（《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 年 11 月

9日)。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到了行將卸任之時，仍要針對「港獨」提出「防微杜漸」，反駁接任的林鄭月娥所說「港獨」未成思潮（《香港01》，2017年6月13日）。引伸所致，就是由中港兩地的高級官員，到親共愛字組織放出來的街頭嘍囉，經常都在質問別人是不是「中國人」作為反擊對手的言論武器。

這些寧枉無縱之舉，對一切不順從的力量都一律貼上「港獨」標籤，就是要把愛國主義（中共統治）變成完全無以尚之，繼而用來壓倒自由、民主、法治那一類本是難以逾越的普世價值（張少強，2017b）。當中所要達到的目的並不一定要如儒家所言的「王道」，令人「中心悅而誠服」（王浩良，2010：頁46），也不一定要如 Gramsci（1971）所說的「統領權」（hegemony），令人感到有節有理。即使當權者確是相信自己是在以德服人，以理行事，這些寧枉無縱之舉更大程度是在施展 Furedi（2007）所講的「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當權者把自己受到的威脅變成對「中國人」的集體威脅，令「中國人」受到情緒刺激而被動員出來。若然沒有主動同仇敵愾地要跟當權者一起剷除威脅，也至少要令受支配的「中國人」知所戒懼，恐受株連，不敢靠近任何跟當權者意志相違的人和事。然而，同樣由於這些寧枉無縱之舉使然，只要愛國主義的壓倒性愈強，與之對立的人和事例必愈多，更令反抗者必須無懼，走向更誓不兩立的、超出底線的激烈對抗。

就這樣，「一國」已不是當初所想，可以成為超越「兩制」的共同點，反而變成要跟「兩制」起衝突的導火線。香港終要跟中國短兵相接，中國也終要跟香港正面交鋒，結果就是步入了一場沒有選擇餘地的現實政治鬥爭，在無法斡旋的「一國」與「兩制」之間，陷入勢所難免的「社會撕裂」，國家主權想要確立的統治秩序受到香港本土的根本撞擊，香港本土想有的自我捍衛遭到國家主權的嚴重破損。可以預期的是，即使強弱懸

殊，香港也多只求守住本土而已，宛如 2015 年的中港足球比賽那樣能夠逼和中國已可極之亢奮（《端傳媒》，2015 年 9 月 5 日），然而這還是香港，也是中國，不想看見但又難以擺脫的一個對立結構。中港之間已注定要有更多的緊張與對抗，一國兩制所要延擱的歷史差異終歸照樣來臨，歷史宿命還是從天而降，逃不過，躲不了，對着這個人間的一國兩制冷笑。本是說好的 50 年期限提早結束，時空的錯置已超乎後殖民香港仍然「殖民家國外」，「現在才是真的 1997」（羅永生，2014b：頁 ix），而是兀然走到了本土家國內，現在已過了 2047。

後九七香港確已後殖民起來，「後」字在此是指並非單純停留在殖民情狀而是超出了殖民情狀。可惜的是，這一個後殖民情狀，既令專權者不得要領，更令一切想要「脫帝解殖」的本土主體受到無間殖民之害，連同大國誓要專權統攝之苦。2017 年，習近平訪港三天，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年。7 月 1 日，當天早上，他在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正式宣誓就任的時刻，就是繼續訓示香港：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絕不允許。……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甚麼政見或主張，中央都願意與之溝通。（香港政府新聞網，2017 年 7 月 1 日）

同日晚上，這個城市的上空則有國家要人昂首仰望的煙花慶祝。在霓虹璀璨的維多利亞港，一幕接一幕的煙花匯演，騰霄漢，凌雲端，隨着抑揚頓挫的樂曲節奏，橫空並爆，齊飛共舞，盡在蒼茫的漆黑夜色，金輝吐閃菊、銀華垂燦柳、紫熠散炯姿、紅燁發耀圖，誓向世人展露「繁榮安定」的萬千光芒，

「回歸祖國」的美不勝收。中共軍方的航空母艦遼寧號也將龐然南下，以巨大的艦身、武器的裝置、甲板上的解放軍及戰鬥機，在香港海域，耀國家之武、揚主權之威、鞏一黨之政。香港本土卻已全日遇到警方的嚴密駐守，自身生活只可逃往沒有控制的範圍進行。民間社會的不同力量，更要面對警方以保護國家主席之名所採取的反恐級行動部署，只能在警方的牢牢封鎖之內，舉起已被包圍的拳頭，叫出受到隔絕的口號（《聯合新聞網》，2017年6月29日）。這是一國兩制在香港二十周年紀念的一天，也活像這個後殖民城市一路走來的每一天。

參考文獻

-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人大釋法亮出中央反「港獨」紅線〉，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11/08/node_865.htm，瀏覽日期：2017年6月28日。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0）：〈推動中英關係，爭取和平合作〉，《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79-86。
- 中國人大網（2017），〈國歌法立法〉，<http://www.scio.gov.cn/zfbps/gqbps/Document/1435501/1435501.htm>，瀏覽日期：2017年9月7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http://www.npc.gov.cn/npc/lfzt/rlyw/node_32814.htm，瀏覽日期：2017年6月28日。
- 《文匯報》（2015），〈習近平：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動搖〉，<http://paper.wenweipo.com/2015/12/24/HK1512240001.htm>，瀏覽日期：2017年6月28日。
- 毛澤東（1963）：〈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999。《毛澤東選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浩良（譯注）（2010）：《孟子譯注》，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 民間人權陣線（2017），《2017七一宣言》，<https://www.facebook.com/CivilHumanRightsFront>，瀏覽日期：2017年6月28日。

- 《立場新聞》(2017)，〈中大開學日現港獨宣傳，政治犯名單披民主女神像〉，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中大開學日現港獨宣傳 - 政治犯名單披民主女神像/](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中大開學日現港獨宣傳-政治犯名單披民主女神像/)，瀏覽日期：2017年9月14日。
- 任海（1997）：〈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跨國資本主義〉，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評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27-150。
- 吳永章（1998）：《中國土司制度淵源與發展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呂大樂（2011）：〈在倫敦與香港之間：麥理浩年代的殖民性〉，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287-301。
- 李立峯、陳韜文（2013）：〈初探香港「社運社會」：分析香港社會集體抗爭行動的形態和發展〉，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編：《香港·論述·傳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243-269。
- 岩淵功一（1994）：〈共犯的異國情調〉（李梅侶、何潔玲、林海容譯），羅永生、許寶強編譯（1998）：《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91-234。
- 《明報》（2017），〈林鄭提幼兒階段加強國民身分認同，黃之鋒質疑準備洗腦教育，鄧飛：正本清源〉，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70621/s00001/1498009189471，瀏覽日期：2017年6月28日。
- 《明報》（2017），〈袁國強：國家是業主，有權「租番間房」〉，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27/s00001/1501091884645，瀏覽日期：2017年8月30日。
- 金堯如（1998）：《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香港：田園書屋。
- 《星島日報》（2017），〈張德江冀新特首團結各界〉，<https://hk.news.yahoo.com/張德江冀新特首團結各界-221114041.html>，瀏覽日期：2017年8月20日。
- 《香港01》（2017），〈中國外交部：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不具任何現實意義及約束力〉，[https://www.hk01.com/港聞/101749/中國外交部 - 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 - 不具任何現實意義及約束力](https://www.hk01.com/港聞/101749/中國外交部-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不具任何現實意義及約束力)，瀏覽日期：2017年8月20日。
- 《香港01》（2017），〈林鄭質疑港獨是否成思潮，梁振英稱要以台獨為鑑，防微杜漸〉，<https://www.hk01.com/港聞/97481/林鄭質疑港獨是否成思>

- 潮 - 梁振英稱要以台獨為鑑 - 防微杜漸，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0 日。
- 香港民族黨（2017），〈香港民族黨面書〉，<https://www.facebook.com/hknationalparty/>，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
- 香港政府新聞網（2007），〈國家主席胡錦濤 6 月 30 日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歡迎晚宴講話全文〉，<http://archive.news.gov.hk/isd/ebulletin/tc/category/ontherecord/070701/print/070701tc11002.htm>，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
- 香港政府新聞網（2015），〈認識戰爭，珍惜和平〉，http://www.news.gov.hk/tc/record/html/2015/08/20150826_171259.s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
- 香港政府新聞網（2017），〈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關係〉，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admin/html/2017/07/20170701_120346.s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 日。
- 香港歸英運動（2017），〈香港歸英運面書〉，<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andUKreunite/>，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
- 《基本法》（2017）：香港：政府物流服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張少強、崔志暉（2015）：《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香港：三聯書店。
- 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2013）：〈導言：範式轉移〉，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編：《香港·論述·傳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xii-xx。
- 張少強（2014）：〈臨界之都：導言〉，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編：《香港·城市·想像》，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頁 xi-xxiv。
- 張少強（2016）：《管治新界：地權，父權與主權》，香港：中華書局。
- 張少強（2016）：〈掙磚：抗爭循環與「旺角暴亂」〉，《第七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與會論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1 月 20 日。
- 張少強（2017a）：〈在本土與國族之間：後殖民香港電影還有自主策略嗎？〉，羅金義編：《香港精神的變易：回歸 20 年》，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頁 105-128。
- 張少強（2017b）：〈戰線與底線：論愛國主義〉，載《世界》，第一期，頁 165-174。
- 強世功（2008a）：〈「一國兩制」的歷史源流〉，《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109-122。
- 強世功（2008b）：〈「一國」之謎：Country vs State〉，《中國香港：文化與政

- 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123-138。
- 強世功（2008c）：〈「一國」之謎：中國 vs 帝國〉，《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139-158。
- 梁振英（2012）：「有守有為發展中港關係」。http://archive.news.gov.hk/tc/categories/admin/html/2012/10/20121017_121305.s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 梁振英（2013），〈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3/chi，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 陳光興（2006）：《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
- 陳冠中（2013）：《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陳智傑（2013）：〈香港身份與中國論述的互動：曾蔭權年代的香港本土主義〉，羅金義、鄭宇碩編：《留給梁振英的棋局：通析曾蔭權時代》，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頁 245-265。
- 陳雲（2011）：《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
- 陳雲（2014）：《香港城邦論 II》，香港：天窗出版社。
- 《經濟日報》（2017），〈黃之鋒、羅冠聰等判，5 年內不能參選立法會、區議會〉，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83211/黃之鋒、羅冠聰等判囚 5 年內不能參選立法會、區議會，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30 日。
- 《端傳媒》（2015），〈忽然熱情的球迷，守着龍門或是香港？〉，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4-hongkong-football02/，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
- 劉兆佳（2013）：《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
- 劉兆佳（2014）：《香港的獨特民主路》，香港：商務印書館。
- 鄧小平（1993）：《鄧小平論香港問題》，香港：三聯書店。
- 《環球時報》（2016），〈社評：香港書商配合調查真是被炒作歪了〉，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6-01/8323385.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 日。
- 《聯合新聞網》（2017），〈習近平訪港 3 天，香港變為禁區之城〉，https://udn.com/news/story/11252/2554398，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
- 羅永生（2007）：《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羅永生（2014a）：〈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90-98。
- 羅永生（2014b）：〈序言〉，《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ix-xi。

《蘋果日報》(2016),〈王振民：港獨不能進入中小學年〉,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817/19739613>, 瀏覽日期：2017年6月28日。

Dirlik, Arif (1989), "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21, No. 1, pp.33-44.

Fannon, Frantz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 London: Pluto Press.

Furedi, Frank (2007), *The Politics of fear: Beyond Left and Right*. London: Continuum.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Hardt, Michael &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uan Hsin-chi (2003), "Power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Sing Ming (ed.),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11-435.

Memmi, Albert (1965),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Boston: Beacon Press.

Nady, Ashis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cholas, Thomas (ed.) (1999), *Democracy Denied: Identity, Civil Society and Illiberal Democracy in Hong Kong*. Sydney: Ashgate.

Said, Edward,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

Wong, Chun Kit (2017), "The Production of Tong Fang in Hong Kong: A Supply Side Analysis with Rent Monopoly Rent" (MPhil Thesis). Hong Kong: The Baptis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